

理性的聲音

——汪小川《二鋪調查》四十五周年祭

◎ 杜應國

一、歷史的「誤讀」

原中共貴州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汪小川，曾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搞過一個聞名全省的「二鋪調查」。之所以聞名全省，是因為文革初起，「二鋪調查」就受到了極為嚴厲的批判。汪先生是貴州第一個被拋出來的黨內人物，是文革紅色祭壇上最早倒下的一批犧牲品之一，所以省內報刊上全是連篇累牘的批判文章，諸如「堅決拔掉汪小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旗」、「徹底揭露汪小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本質」等等。其中，「二鋪調查」作為他「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綱領」，自然是批判的重點，說他「鼓吹包產到戶」，「鼓吹單幹」，鼓吹「走資本主義道路」云云。八十年代初，當包產到戶再度浮出水面並取得合法化身份，成為農村改革的突破口，進而更成為舉國上下奉行不怠的基本國策時，我不由想起了汪小川，想起了他的「二鋪調查」，心中暗暗佩服他的遠見卓識，深為我省貴州能有這樣頭腦敏銳，思想開放且言說大膽的官員而欣慰。前幾年，有朋友接了個農村研究的課題，我還一本正經地向她建議，應對貴州數十年來的農村研究及其學術成果作一番梳理，尤其要給「二鋪調查」寫上濃重一筆。但朋友最終未能找到「二鋪調查」，還抱怨說到處都查不到這份東西，結題報告中只好一語帶過。我不免感到奇怪，這才想起自己對這份十分耳熟的材料，似乎也只是僅聞其名而未見其文，心中自不免有幾分好笑。於是開始四下留心打問，但幾乎問遍了身邊認識的人，都沒有誰見過這份材料。這倒奇了，一份被示眾多年的東西，居然無人真正知道它的本來面目，豈非笑話？直到後來讀到一篇介紹「二鋪調查」的文章，方知這是一份從來就沒有公開發表過的材料，當年僅列印了幾份供省委領導參考，無怪一般人皆不知其廬山真面目了。最後，誤打誤撞，竟陰差陽錯地撞到劉學洙先生面下，承他美意，迅速為我複印了一份「二鋪調查」並其他相關資料寄來，如此方得一睹為快。學洙先生是汪小川的老部下，退休前為《貴州日報》總編，恰是當年汪兼任的職務，有關汪的情況和材料自是了解多多。正所謂「踏破鐵靴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幸甚。

不過，認真讀完這份想望已久的材料，我卻有些失望甚至失落。材料名稱為《安順二鋪的調查材料》（以下簡稱《二鋪調查》），共包括七份檔，依次為（一）前言：如何扭轉單幹傾向；（二）從中所看幹土分到戶（缺）；（三）石龍大隊座談會紀要；（四）雲峰公社支委支委百分之九十以上主張包產到戶；（五）二鋪區農村市場的幾點情況；（六）對某些經濟政策的一些反映；（七）附：關於經濟領導工作的幾點意見。全部材料合共約一萬五千餘字。其主體部分（即真正的「調查」部分）實為隨行人員執筆整理，僅「前言」和附錄為汪小川所擬。而恰恰是這最能反映他意見的部分讓我大失所望，其內容已如標題所示「如何扭

轉單幹傾向」，意在糾偏，即糾正包產到戶，而不是像原先的批判所說「主張包產到戶」！這一出乎意外的發現一時竟讓我有點不知所措，我沒想到當年的大批判竟給我留下了這樣一個延續多年的「誤讀」（也可見當年的批判者們為了羅織罪名可以荒唐到何等地步），心中那個「貴州包產到戶的思想先驅、代表人物」的形象，一下就被顛覆了，原打算想為他寫點甚麼的衝動也幾乎因此而廢止——我無論如何也落不下筆去。

平心而論，《二鋪調查》也並非就因此而失去其應有的價值，譬如文中照錄下來的那些反映農民強烈要求包產到戶的聲音——「就是拿機槍抵在肚皮上也不願收歸集體」、「集體生產能搞好我願砍頭」等等，今天讀來猶覺震撼人心；而汪小川在「前言」中所表達的某些意見——譬如他一再強調農民受到挫傷的積極性，強調農民對集體生產失去的信心，提出採用經濟方法而不用行政手段糾正「單幹」等，放到幾十年前那個特定的背景下，也自有其可貴之處。但主張扭轉「單幹」和主張包產到戶畢竟是完全對立的兩面，而今的研究者又將如何來面對這個真實的汪小川，如何來解讀這明顯的矛盾呢？更讓人困惑的是，意在糾偏的調查，為何還敢把那麼多出自農民之口、強烈主張包產到戶的話全都記錄下來？這意味著甚麼，又將會冒多大的政治風險他難道不知道？在真實反應農民要求和委婉糾偏之間，究竟有著一種怎樣的鏈結？換言之，其外顯的矛盾與內隱的心曲究竟存在著一種怎樣的關聯呢？數月來，我沉緬於各種資料的翻查中，反復閱讀著劉學洙先生寄來的那些相關資料，包括《衝出絕境》、《我目擊下的貴州大四清》、以及新出的《歷史小故事》等，企望能從中找到點有價值的線索，以助我解開心頭的謎團，走近那個真實的汪小川和他真實的思考。直到讀完他那曾備受批判的「九篇歷史小故事」之後，我方覺眼前一亮，豁然開朗，頓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我注意到，「九篇歷史小故事」的寫作時間與二鋪調查的時間十分接近。二鋪調查始於1962年4月初，「九篇歷史小故事」的寫作則始於同年6月，其開篇之作〈李世民懷中的死鷄子〉，借唐太宗與他所敬畏的諫臣魏徵說事，強調聽取不同意見的重要。所謂「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僅此一語，一下竟將我點透，忽而就覺得隱約摸到了汪小川及其「二鋪調查」的某種內在理路。不敢說發現了甚麼微言大義，但若由此切入，不惟那表面的矛盾和內隱的心曲能夠理解，而且更可從中窺見在複雜的黨內鬥爭環境下，相當一批高、中級幹部的思想狀況及其動向，進而為我們理解當時的黨內紛爭及後來的歷史演變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從這個角度看，汪小川的《二鋪調查》倒成了一份難得的歷史文本，內中包含著不少有價值的資訊，隱秘地傳遞出大躍進以後黨內鬥爭與黨內分歧的某種深層背景和複雜原因。

為此，我們就需要返回當年的語境，弄清一些相關的社會、歷史背景，如此方能正確地解讀《二鋪調查》所蘊涵的歷史資訊，並客觀地估量其文本價值。

二、背景之一：毛澤東大倡調查研究

1962年春，汪小川率隊來到當時的安順縣二鋪區搞調查，此舉並非突發奇想，空穴來風，而是直接源自毛澤東的大力宣導。

1958年發動的大躍進，其惡果在1959年就已經顯現。大躍進中出現的浮誇風、共產風、主觀主義、強迫命令、急躁蠻幹等一系列過激、過左的做法，給中國的農民、農村和農業帶來了極大損害。所以，從1958年11月起，在連續召開的一系列會議上（如第一、二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八屆六中、七中全會等），親手發動了大躍進的毛澤東開始考慮如何

著手糾左。他在各種會議上侃侃而談，大講「壓縮空氣」，大講「客觀規律」，反對共產風；還要人們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注重「商品交換」，注重「價值法則」等等。他不相信自己的得意之筆已經闖下大禍，引發成了一場巨大的全民性災難，還想不動聲色地糾正運動中的過火行為。但對於一架已經發燒至高熱的機器來說，這種輕描淡寫的降溫顯然是不可能使之迅速冷卻的。到準備繼續糾左的廬山會議召開時，國內的經濟形勢已十分嚴峻，部分農村地區的缺糧現象已經出現。一些了解情況的領導人如彭德懷等，憂心忡忡，懷著沉重的心情登上廬山，而毛澤東則仍沉浸在他的政治浪漫主義所幻化出來的詩情畫意裏，所以他把這次會議稱作「神仙會」，與幾位元老酬詩唱和，一派輕鬆，真有幾分飄飄欲仙的架勢。卻不料會議進程中，彭德懷的一封信引起霹靂震怒，會議急劇轉向，揭開了反右傾的大幕，經濟調整由此錯失良機。彷彿是為了證實自己的正確與決心，毛不僅在一封信中豪邁地宣稱：「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雪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¹ 而且，更在會後發出了繼續躍進、更大躍進的號召，致使已經嚴重失調的國民經濟幾乎完全脫樺，瀕臨崩潰的邊緣。到了1960年，一個農業大國最可怕的事終於發生了，這就是席捲全國的大饑荒。糧食供應全面告急。6月6日，中共中央在《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中指出，北京、天津、上海、遼寧等大城市和工業區的糧食庫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銷7天，天津只能銷10天，上海已經幾乎沒有大米庫存，遼寧十個城市只能銷8、9天。² 當時的周恩來日夜焦慮，親自指揮調運糧食，被稱為「糧食調度總指揮」。但連續兩年的高指標已經徵購了太多的過頭糧，許多地方已是無糧可調，經過大躍進的洗滌，有的農民已是家徒四壁。農村大面積的死亡、浮腫和外出逃荒現象正在四處蔓延，形勢已十分危急。只是各地都在拼命封鎖、掩蓋，不敢如實上報，以至同年四月，分管農業的中央書記譚震林還在向毛澤東匯報：

糧食形勢也是好的，我們派了幾個考察團到安徽阜陽專區，考察的結果，他們反映的材料，事實上，那個死人是個別的，多數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數也不多，而且糧食吃得相當多……他們這裏（指河北省——引者註）的大名縣也叫做有糧食問題的，我們也派了一個組去摸，一摸底，實際上並不是甚麼每天八兩、十二兩，而是吃一斤，人的臉都紅光滿面，不像吃八兩糧食的樣子。³

然而，大面積的死人事件所釀成的巨大慘禍還是隱瞞不住地被揭開了。1960年10月，令人髮指的信陽事件終於東窗事發，數十萬人口的「非正常死亡」，⁴ 不能不使毛澤東受到極大的震動。據當時的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講：「我到光山（信陽地區的一個縣）去看過，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確實是這樣，這不是甚麼右傾機會主義攻擊我們，這是真的。」⁵ 同時，引起毛注意的，還有一份湖北省委書記王延春關於沔陽縣通海口公社刮共產風的情況匯報，其中寫道：

這個公社的「共產風」年年季季在刮，年年季季在處理，可是邊處理邊刮，一直刮到工作隊進村的時候——9月4日，這一天有的生產隊還在沒收社員的自留地；……刮「共產風」的範圍，大至土地、糧食、房屋，小至鐮刀、筷子、夜壺，甚麼都刮。全公社算了一筆賬，共亂調勞動力349個，土地8020畝，房屋1512棟，資金（包括分配未兌現的）53萬元，糧食53萬斤，家俱35040件，耕牛84頭，木料等84萬斤，磚瓦147萬塊，傢俱24906件。⁶

對於當時出現的全國性大饑荒，毛澤東並非毫不知情，有報導說，毛在這一年有七個月沒有

吃肉，原因是他知道全國人民在挨餓，自己心裏不好受，也要跟著受苦云云。但毛恐怕不會認為這是自己的錯，是大躍進的錯，他似乎更傾向於認為，這是因為下面的幹部胡作非為，欺下瞞上，導致上面不能了解到真實的情況，使問題得不到及時處理的緣故。所以，就在這一年的年尾，毛突然下定決心，要搞調查研究！他不僅讓自己身邊的衛士下去調查，而且更在同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其後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上公開號召，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搞一個「實事求是年」，「一個調查年」。會後，根據毛的這一提議，幾位中央高層領導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陳雲等，各自紛紛下到農村搞調查。劉少奇到湖南，周恩來到河北，朱德回到四川老家，鄧小平與彭真到了北京郊區的順義和懷柔。同時，毛澤東還指派自己的三大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各自帶隊，組成中央調查組，分赴廣東、湖南、浙江三地進行調查。這一年五月，毛作出解散公共食堂的決定，就與胡喬木調查反映的情況直接有關。不僅如此，包括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在內的中央各部委的頭頭們，也都紛紛組成了自己的調查組，有的還由一把手帶隊前往農村。一時之間，調查成風，各中央局，各省市也都紛起效法。——這就是汪小川「二鋪調查」的來源。順便說說，汪的調查並不止此一樁，他還搞過「平壩調查」、「銅仁羅江調查」、「江口閔孝調查」等等。

三、背景之二：七千人大會

1962年元月11日至2月7日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著名的七千人大會，是令許多親歷者事後談起來仍然激動不已的一次會議。大體說來，這次會議有三大亮點：一是劉少奇代表中央作了口頭報告（另有書面報告），前所未有地指出了指導工作中的嚴重錯誤；二是鄧小平代表中央宣布，對前一段反右傾中受到錯誤批判的人進行甄別平反，一風吹，當然不包括「彭、黃、張、周」諸人；三是臨近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宣導的「出氣會」，廣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毛帶頭表示對前一段的工作失誤承擔責任；周恩來、鄧小平等亦在講話中作了自我檢討，分擔責任；隨之各省各部的負責人也紛紛檢討，承認錯誤。據說此舉給與會者極大的鼓舞，基層幹部的滿腹怨氣渙然冰釋，化作了歡欣鼓舞與心情舒暢。

此次會議，其直接起因是中央調拔糧食已愈來愈困難，各地方當局——鑒於自1960年以來出現的大面積糧荒和信陽事件的嚴重影響，已開始有了一定的自保意識，恰如李先念所說，「過去是以少報多，現在是以多報少。」鄧小平也批評一些地方「向中央講策略，搞後手。」「現在是各有各的打算，講的數字不真實，困難也不真實。」⁷ 所以會議原定是要解決分散主義問題，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加強全局觀念，加強集中統一領導。但事實上，糧食調拔困難固有一定的地方因素影響，但更深沉的原因還是大躍進竭澤而漁的做法，加上連續幾年的歉收，農民連果腹都已成了問題，哪裏還有糧食可徵、可調？此外，在共產主義指日可待的高調躍進之後突如其來的大饑荒，也使不少人疑竇叢生，滿腹的困惑和迷茫，思想混亂，情緒低落，正如毛澤東的詩句：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曾幾何時到處都是豐收的喜訊，糧食多到吃不完的地步，有的甚至提出吃飯不要錢，為甚麼一夜之間卻處處糧荒，滿目蕭然？那麼多的糧食到哪裏去了？曾幾何時高喊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兩三年就能實現的天堂日子何以會變成眼前這般的「淒淒慘慘戚戚」？面對殘酷的事實，人們不能不置疑，不能不追問：這一切究竟是怎樣造成的？大躍進對不對？人民公社是不是辦早了？誰該對此負責？這是天災還是人禍？中央有沒有責任？⁸ 一句話，人民滿腹怨氣，幹部尤其是基層幹部則憂心忡忡，一片茫然，既不知前路何在，又擔心犯下錯誤，被扣上「右傾」、「保守」的帽子。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61年11月10日，由劉、鄧主持召開了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專門落實糧食徵購和上調問題。不想，會議一開場就陷於僵局，各方大員面

對中央要求皆有難色，囁嚅其詞，既不能推諉，又難於應承。無奈之下，陶鑄提議不如召開一次地級以上會議，以打通思想，完成必需的徵調任務。此議立即得到鄧小平的贊同，事後向毛澤東匯報時，毛亦感覺不錯，是個辦法，大筆一揮，決定將會議擴大到縣委一級，並要求相關的企事業單位負責人也參加，由此定下了七千人大會的規模與格局。

七千人大會最具衝擊力的，是劉少奇在會上作的口頭報告。本來，按照事先安排，劉少奇代表中央作的是書面報告，為此還專門組織了一個由陳伯達牽頭負責的起草班子，參加的人有田家英、胡繩、吳冷西等。按常規，報告起草後，經劉、鄧審閱，再轉呈毛，毛閱後再批轉政治局審議通過，即可作為正式報告。但這一次，常規卻被罕有例外地打破了。由於時間緊，劉少奇的書面報告採取分段送審的方式，完成一部分便送一部分到毛處。第一、二部分毛很快地就看完了，唯獨第三部分卻遲遲沒有看完，乃至要劉推遲三天再作書面報告，繼而又改變主意，決定書面報告不作，也無須再經政治局討論，而是將之作為會議材料先印發與會者討論，另由劉少奇再作一個口頭報告。這一反常之舉實在耐人尋味，以至出現了這樣的戲劇性場面：劉於當晚連夜趕寫出的口頭報告提綱，因無法及時送毛閱看，只好借第二天開會前在休息室的短暫時間請毛審閱，毛看完一頁，遞一頁給其他中央常委傳看。雖說口頭報告是臨時動議，但劉少奇對所談的問題早已爛熟於胸，他滔滔不絕，一氣講了三個多小時。他的坦誠，他的清醒，他的敢於直面困難，直面缺點和錯誤的勇氣，一再激起陣陣熱烈的掌聲。尤其是當講到「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一語時，據說全場爆發的掌聲長達數分鐘之久。⁹應該說，這是劉少奇少有的幾次有意擺脫毛的定音調而作出的一次精彩演出，對他而言——至少在文革前十年的時間裏，這樣的演出是不多的。不過，也正如今天的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劉少奇在報告中談到三個指頭與七個指頭的關係，以及「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等等的說法，已經大大突破了毛的「錯誤難免論」和「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比例框架，由此招來大忌，為爾後的悲劇埋下了伏根。此說雖不無道理，但屬後話。就當時來說，除了毛，恐怕不會有人想到這是毛、劉分歧的表現。因此，不難想像，當代表們離開北京，回到各地，將有關承認缺點錯誤、批評與自我批評，以及毛在「出氣會」上關於發揚民主，允許不同意見等等的大會精神傳達開來時，像汪小川這樣敏感而又多思的領導幹部，會受到怎樣的鼓舞，又會採取甚麼樣的積極姿態來予以回應了。

四、背景之三：包產到戶的爭論

發軔於1956年合作化運動中的包產到戶，從一誕生起，就是針對著集體化生產中不可避免的一窩風、平均主義、缺乏責任心和積極性等各種問題和弊端而由農民們自發創造出來的一種生產責任制形式，其最大特徵就是一個「包」字。當時的不少地方如四川的江津、廣東的順德，安徽的蕪湖，江蘇的鹽城，浙江的永嘉等等，都出現了在生產隊向合作社承包生產任務的基礎上，又向生產組和個人實行包工包產的現象，稱之為「兩級承包制」；有的地方因只將田間管理承包到戶，又叫「分戶田間管理責任制」。由於它簡便易行，職責明確而富有效益，符合傳統農業生產的特點，深受廣大農民歡迎，所以1957年即迅速蔓延到很多地方。但也正因它以戶為主，分散易行的特點，與集體生產、集體勞動、集體分配的合作社理想總似乎不那麼合拍，因此從它產生的那一天起就充滿了爭議。褒之者將之譽為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貶之者則將之視為集體化的倒退，是單幹，是資本主義傾向等。在集體化等於社會主義，個體等於資本主義的邏輯中，包產到戶很容易與資本主義掛上鉤，所以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立即遭到了批判和否定。從此，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逐漸形成了這樣的思維模式：包產到戶=單幹=走資本主義。

但與這種僵固的思維模式相反，中國農民似乎鐵定了要走這條路的決心。於是出現了包產到戶屢禁不絕，屢禁不止乃至屢仆屢起的奇怪現象。經過1958年的大折騰之後，1959年各地為了應對春荒又悄悄冒頭的包產到戶，雖經廬山會議的嚴厲打壓又縮了回去，但隨之又在大饑荒的1961年捲土重來，並迅速蔓延，安徽、河北、河南、湖南、浙江、廣西、陝西、甘肅、貴州等省，包產到戶不脛而走。儘管它仍然沒有合法化，不少地方還在沿襲著以往一套左的做法嚴加禁止，但面對連續三年的大饑荒和無數非正常死亡的陰影，地方幹部們此時已是焦頭爛額，束手無策，而況事實證明，包產到戶確實是最有效也最受廣大農民歡迎的自救之策，因此，許多中下級幹部尤其是農村幹部，大多對之採取了睜眼閉眼的默許態度。到1962年上半年，中國農村的包產到戶之風可謂強勁吹拂，愈演愈烈，形成了後來被毛澤東嚴加指責的所謂「單幹風」。

就貴州而言，大約自七千人大會之後不久就開始著手糾正包產到戶了。七千人大會雖未將包產到戶列為議題，但會議進程中發生的一件事，卻向各地傳遞出一個不祥的資訊，這就是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在會上突遭解職。曾希聖被撤職的原因是所謂「五風」問題（即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直接來自會議期間安徽省幹部對他的不滿和揭發，主要是說他作風粗暴，不民主，獨斷專行，容不得不同意見等等。當然，還有一項罪名，雖未作為重點，卻極具震懾，這就是他曾在安徽大力推行的「責任田」（實為包產到戶的又一別名）。誰都知道，曾希聖在大躍進中也同樣頭腦發熱，跟著辦了不少蠢事，致使安徽受害不淺，餓死了不少人，及至事後清醒，方知局勢嚴峻，心中自是十分懊悔。為了幫助農民度過饑荒，他發現了包產到戶的好處，乃四下鼓吹，並多次向毛澤東請示匯報，終於得到毛的首肯，同意他進行試驗。曾氏欣喜異常，告訴屬下「已經通天了」，要大家放手試驗。一時之間，安徽的「責任田」聲名鵲起，被老百姓稱之為「救命田」而廣為傳頌。曾希聖一向深得毛澤東信任，1961年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被撤職，曾氏被指為代理，以一省之方面大員而兼任兩省的第一書記，這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往後都極其罕見，所以有「大紅人」之稱。孰料翻雲覆雨之間，「大紅人」一變而為「大黴人」，誰不為之心悸膽寒？大約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便有了中共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的「黔南來信」，要求省委著手糾正包產到戶。緊接著，1962年4月8日——也就是汪小川的二鋪調查剛一結束，中共安順市委就發出了《關於糾正包產到戶情況的報告》。這就是說，至少在當時的貴州，糾正包產到戶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主流趨勢了。

五、《二鋪調查》的文本意蘊

汪小川一行於1962年3月31日到達安順，4月1日即前往當時的二鋪區，在聽過區委負責人的介紹之後，確定了三個調查點，一是二鋪公社的石龍大隊，二是雲峰公社的小山大隊，三是馬場公社的中所大隊。歷時約八天左右。調查方式多以座談為主。順便說說，二鋪區即是今天人們所熟知的屯堡區之一，雲峰公社也即而今有名的屯堡景區雲峰八寨。汪小川選中這一帶搞調查，會不會與屯堡人善經商的傳統有關？在那個年代，經商就是「投機倒把」，就是「市場經濟」，而「市場」不正是農村經濟狀況一個最好的窺視孔嗎？從材料中專門有一份二鋪區農村市場情況的調查看，作此推測似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由於《二鋪調查》並非完全出自汪小川的手筆，更由於他親自撰寫的「前言」和「附錄」應當是更能反映他的認識和看法的直接文本，所以，今天來考量《二鋪調查》的意義或價值，就有必要對之作出適當的區別。下面先來看看那部分屬於座談整理的調查材料。

今天來看，這部分材料最可貴的地方，就是真實記錄和傳達了廣大農民強烈要求包產到戶的心聲，因此，材料中有許多直言不諱的語言，表達了農民們對糾正包產到戶做法的嚴重不滿，嚴重抵觸。如：

在這幾年，酸、甜、苦、辣都嘗過了，飯也餓夠了，認為「只有各幹各，不然還要餓飯」。現在社員大多數都主張單幹，全隊已有十多戶公開提出要求田、土到戶。（《石龍大隊座談會紀要》）。

我們去的那天，公社正在召開大隊以上幹部會，討論糾正包產到戶。到會的幹部認為：現在無法糾正，據說有的群眾講「就是把機槍抵在肚皮上，也是不願收歸集體」。「要叫我們餓飯，就把土地拿回去，要叫吃飽，就讓我們這樣做年把看」。「要讓土裏長草餵老蛇，就收回去」，你們是「可丟不可修」。（同上）

從調查組在雲峰公社參加的一次黨內會議看，會上主張包產到戶的傾向簡直令人吃驚。

雲峰公社最近召開了一次支部書記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支書、支委和團支部書記一共三十五人，從會上暴露的思想來看，有三十二人認為集體生產不好，主張田土下放，佔到會人數的百分之九十四。並且他們已採取各種形式下放了土地。據會上的統計，田土全部下放實行單幹的有二百四十畝；田集體土分到戶的一百四十五畝；小季包產到戶四百一十五畝（有少部分沒有包產任務誰種誰收）；分集體田土給社員種洋芋五百二十三畝；擴大自留地三百二十七畝（不包括個人開荒），共計一千三百七十六畝，佔全社耕種面積七千四百二十八畝的百分之二十。上述各種形式在十二個大隊七十三個生產隊中均有發生，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雲峰公社支書支委百分之九十以上主張包產到戶》）

除此之外，材料中還透露出農民們對幾年大躍進、對人民公社運動等等的的不滿。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集體生產的不滿。

「能不能把集體生產搞好？」他們認為不可能。

小山大隊支書雷仲和，列舉辦人民公社以來，生產連年下降的事實，來證明這一點。小山大隊歷來的糧食產量為一九五七年二十八萬斤，一九五八年二十六萬斤，一九五九年二十四萬斤，一九六〇年二十萬斤，一九六一年十二萬斤。他從減產的事實中得出結論：「如果說集體生產能搞好，我願砍頭」。（同上）

農民不比工人，工人非搞集體不可，農民就不行。為甚麼，吳屯大隊支書徐起伯說：「人多人懶，狗多狗饞」，你出工早，我出工晚，有的做活快，有的做活慢。農民習慣單家獨戶的生產，祖祖輩輩都是這樣，一家三哥四弟都要分家，何況幾十個人在一起生產。徐說去年吳屯下放土地，秋收進度很快，板田全部種完，爛田也打好了，出工不用喊。上面叫搞集體生產，社員就灰心了，生產也受損失。他們認為凡是生產搞得好的地方都是各幹各的，集體幹活就是不如個人幹活。（同上）

本寨大隊長李成儒（黨員）說：「包產到戶的地方是我們的方向」。（同上）

其次是對集體分配方式不滿。

在座談中，大家對糧食分配問題，都不同意人勞結合，對半分（地委會規定最低的人勞結合比例為對半），認為從「幹不幹，兩罐飯」和去年的人七勞三，到今年的對半分，好是好了點，但還有平均主義。他們主張全部按勞分配，只照顧五保戶和遇到天災橫禍的真正困難戶。（《石龍大隊座談會紀要》）

社員幹活不起勁，是因為不按勞分配，多做不能多吃，少做也不少吃，每個都有基本口糧。去年實行「人七勞三」分配方法，社員很有意見。（《雲峰公社支書支委百分之九十以上主張包產到戶》）

對於口糧分配，各地提的意見最多，絕大多數人都不同意人勞結合，而要求實行按勞分配，有的社員說：「六十條上明明規定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公社偏要人七勞三，把按勞分配又取消了」。認為「人勞結合還是平均主義」，這種糧食上的平均分配，不利於鞏固集體……有的群眾說，這是「豬羊同圈，黑白不分」，只能把「勤人拖懶，懶人更懶」，是養長毛和尚的政策。（《對某些經濟政策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材料中還反映了幾年大躍進給農村和農業造下的惡果，以及令人深惡痛絕的高指標、高徵購給農民們帶來的巨大傷害，謂之觸目驚心，一點也不為過。如：

他們說，這個大隊一九五四年是一個初級社，一九五六年和湯官屯辦成一個高級社，糧食是連年增產的。到一九五七年曾收過八百多石谷（每石四百斤），這幾年由於生產上的瞎指揮和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到一九六一年只收糧食三百多石，每人口糧只七十至一百二十斤，大隊長汪榮武說：「一日無糧千兵散」，社員口糧少了，牛飼料也沒有了。「沒有飯吃，人心不齊，社員思想落後，不聽話了。」社員們說，辦這幾年公社，「對集體生產灰心完了」。（《石龍大隊座談會紀要》）

耕牛和農具減少了，高級社時期有耕牛七十五頭，現在只有二十二頭，死亡率達百分之七十，現每頭耕牛平均負擔耕地達三十畝。高級社有水車七十多架，現在只有十架了，過去一家一張撻鬥，現在只有四張了。生豬也由過去的八十多頭減少到只有三頭了。（《雲峰公社支書支委百分之九十以上主張包產到戶》）

公社虛報浮誇，不實事求是，購了過頭糧。一九五九年糧食總產為二十四萬斤，徵購任務七萬斤。完成了徵購任務之後，又來了一個「光榮糧」多賣了四萬多斤。去年只收入十二萬斤糧食，徵購任務仍是六萬多斤。完成公餘糧後，全隊每人平均不到一百斤口糧，挫傷了生產積極性。（同上）

舊州區去年有二十二個隊購了過頭糧。一九五七年產糧三千三百萬斤，每人合一千斤，商品糧為四百斤，口糧約六百斤左右，到一九六一年減產為一千四百八十萬斤，徵購九百二十萬斤貿易糧，每人平均只留糧一百八十五斤。因此群眾說：這幾年把基礎搞垮了，這幾年是死任務，活口糧。口糧減得多，任務減得少。「除了鍋巴沒有飯」。該區黃臘公社也是個產糧地區，一九五八年前每人平均的實際口糧，都在六百斤以上。近來連續四年減產很大，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與一九五七年比較，人口少二千多，牛死百分之六十，農具損失更大。但糧食任務仍未減輕，年年購過頭糧，年年又供應。去年產糧二百八十萬斤，徵購一百八十二萬斤。大部分隊每人平均只有幾十斤口糧。現在群眾生產積極性非常低落，十五個大隊中有九個大隊，生產根本不動。（《對某些經濟政策的一些反映》）

請原諒這些大段大段的摘引吧。作為當年那場大饑荒的親歷者，我本人對那段日子也有不少刻骨銘心的記憶，但作為一個城市中人，我至今仍無法想像當時農村的可怕情景。試想一個公社的人均存糧不到兩百斤，有的甚至才幾十斤——而且是毛穀，這意味著甚麼呢？除了饑餓和死亡難道還可能有別的出路嗎？我注意到，材料中似非無意地透露了黃臘公社幾年「減少」（實際就是餓死）兩千多人口的事實。¹⁰ 全國有多少公社？1958年的數字是二萬六千多個，每個公社只算死1000人，就是二千六百多萬！實際數字當然遠不止此，今天的研究者估計多在三千萬至四千萬之間！¹¹ 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數字。八年抗戰，整個中國的死亡人口最高估計也只是三千多萬。中國農民在三年大饑荒中所承受的苦難，所作出的犧牲，至今在許多官書官史中仍未得到公正的評價與合法的交待。

老實講，時隔四十五年來讀這些資料，心中感到的仍是沉重、壓抑和悲涼。那些從農民心底迸發出來的話，無所顧忌，痛快淋漓，今天讀來猶有驚心動魄之感。「集體生產能搞好，我願砍頭」、「就是把機槍抵在肚皮上也不願收歸集體」、「包產到戶的地方是我們的方向」等等，這些出自底層民間，出自草根老農的「真聲音」，這些在當年極為犯忌，隨時有可能遭來大禍的話，說者固屬不易，但將之忠實地記錄下來，轉達出去，則恐怕要冒的風險會更大，也更需要勇氣。汪小川後來的命運證實了這一點。所以，不能不感謝汪小川和他的調查組，沒有他們的實事求是精神，沒有他們的悲憫情懷和無畏擔當，我們今天就不可能聽到這些元氣淋漓的話，這些「原生態」的民間記錄。這是農民們對自身權利的憤怒呼喚，也是對人禍橫行的悲切控訴。從中，我們不僅可以聽到歷史車輪的隱隱滾動聲，而且可以看到來自地層深處並最終導致未來中國發生巨大變革的那條伏線，其邏輯指向就是人民公社的解體和包產到戶的全面推行。筆者所以不避文抄公之嫌，在這裏大段抄錄，就是希望這些飽含著苦難與血淚的「真聲音」，能夠穿透塵封的歲月，閃放出它應有的光亮，而不至被時代的阻隔所遮蔽，所湮滅。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林則徐的這兩句詩，當可作為汪小川及其調查組成員的真正寫照。

所以，我以為，《二鋪調查》作為一份不可多得的思想史資料，不僅在貴州的學術史、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而且在當代中國思想史的文本系列中，也該據有它的一席之地。如果僅就包產到戶問題而言，《二鋪調查》真實地記錄下來的那些農民話語、農民心聲，既是代民立言，更是對另一些出自領導幹部或知識份子之手的、呼籲包產到戶的歷史文本的豐富和補充，故而具有不可替代的文本價值。就中自不難明白，二十年之後興起的包產到戶浪潮，確是順乎民心，合乎民意的歷史必然，是阻擋不住的歷史潮流。惜乎這樣一份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獻，在後來編輯出版的許多有關包產到戶的資料集中都不見蹤影，這實在是貴州學術思想界的一大遺憾。此外，《二鋪調查》作為貴州三農問題研究史上的一份重要材料，它對計劃體制或公社體制下存在的諸多問題和弊端的分析與揭露，以及它那種面對現實，客觀、負責、認真、求實的態度，即使在今天的三農問題研究中，仍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總之，在那個特定的年代，特定的背景下，《二鋪調查》不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貴州理論工作者的思想勇氣和探索精神，而且更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貴州思想界不凡的認識水準和理解能力，確實不愧為貴州思想史上一份極具代表性的歷史文獻。

六、外顯的矛盾和內隱的心曲

《二鋪調查》的目的，從汪小川當時親筆撰寫的〈前言：如何扭轉單幹傾向〉一文看，顯然

是為了糾正包產到戶，正如他自己後來所說：「無論從其文字和精神看，我都不是主張包產到戶，說實話，我當時沒有這種覺悟水準。」¹² 這話說在包產到戶已經「正名」，且重顯輝煌的八十年代，應該是可信的。那麼，「不是主張包產到戶」的汪小川，為甚麼要在調查中真實反映農民包產到戶的呼聲？意在糾偏的《二鋪調查》，為甚麼要忠實地記錄下那麼多農民的心裏話和農村的真實情況呢？換言之，應該如何來看待這個明顯的矛盾？這其中究竟存在著一種怎樣的內在關聯？又隱含著一種怎樣的苦衷和心曲呢？

為此，就需要對汪氏的這篇「前言」再作些適當的分析。

首先，即使是從糾正包產到戶（也即文中所說的「單幹傾向」）著眼，汪小川在文中所作的分析和所流露的不少想法，都可見他確有不少異於常人處的思考。

例如，在分析包產到戶發生的原因時，汪小川並不像一般人通常所喜歡做的那樣，只會一味地指責農民思想落後，走資本主義之類；而是面對現實，實事求是地指出了農民以「吃不飽」為由而搞包產到戶的基本事實。「吃不飽」——這是三年大饑荒中中國農民最大、也最緊迫的現實，也是包產到戶在1959年遭到嚴厲批判之後又重新捲土而來，暗潮洶湧的根本原因。可以說，1962年出現的包產到戶，是中國農民為了戰勝饑餓與死亡迫不得已的選擇，是農民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唯一可依恃的一條破困突圍的自救良策。這一點，甚至包括當時的許多高層領導心裏都很清楚，基層幹部們更是心知肚明，所以，大多對之採取了睜眼閉眼的默許態度。那麼，為甚麼「吃不飽」？為甚麼會發生大饑荒？只要稍加追問，就會迫到大躍進的頭上。汪小川抓住「吃不飽」的現狀，引用農民的話，「所謂『一日無糧千兵散』，所謂『要想吃飽飯，只有搞單幹』」等等，是否隱示著他對大躍進的某種不滿與懷疑？他在文中一再借農民之口，拿1957年前作比較，說「幹部們所最感苦惱的是群眾不『信話』了，不像一九五七年前那樣『信話』了」，而群眾的反應則是：「一九五七年前人心齊，就因為那時候都在說，快有拖拉機，快有電燈電話，誰不指望很快過好日子？！現在甚麼都落空了。」「一九五七年前」還沒有大躍進，沒有人民公社，可見農民們不滿何在，怨氣何來。他顯然深知這其中的根由，直言不諱地分析道：「現在和那時候所不同的地方在哪裏？農民經過這幾年農業生產上的挫折，照他們的話說『灰心完了』。這就是說農民對集體化的信心有所動搖。」——對集體化亦即對人民公社的不滿，這才是促使農民們搞「單幹」、搞包產到戶的真正理由，也即汪小川說的藏在「吃不飽」背後的那個「隱蔽的理由」。他根據了解到的情況分析道：「集體生產因為人心不齊，活路保不住品質，你等我等，浪費了時間，耽誤了季節。也就是說，集體做的活路不細、工效不高，因而不能增產。」針對此他提出：「要在當前情況下，找到吸引住農民在集體裏生產的恰當辦法」，「認真考慮怎樣發揮集體生產的優越性」。儘管這在當時的公社體制下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但這樣的思考方向——即把問題主要歸結於體制，歸結於政策，而不僅僅只是歸咎於農民，至少證明了他對農村狀況和農民實際的了解與同情。更重要的是，這些分析和思考，實際指向的是人民公社最為人所詬病的兩大痼疾——生產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尤其是平均主義，對農民積極性傷害尤大，對農業生產影響尤深。所以汪小川對之亦倍表關切。

「農民最敏感的就是糧食問題。在農民的直感上，糧食怎麼分配，怎麼徵購，怎麼供應，就測量著黨的政策是否兌現了。」針對此，文中列舉了不少農民的意見，如「養懶漢政策」，徵購上「鞭打快牛」，「哪裏生產搞得好，哪裏糧食增產多，哪裏就徵購的多」，以及「人勞結合」上的缺陷，「回銷糧」供應上的不合理等，認為按勞分配搞不好，就不可能真正做到自願互利（人民公社的組織原則之一）。所以他說：「現在農村基層幹部是不大敢向群眾

講『自願互利』這句話的，他們怕一講『自願互利』農民就會更多地散夥了。」這裏已經涉及到了人民公社運動中的「一窩風」及強迫命令問題。顯然，如果完全靠自願互利，就不可能有人民公社運動。倘再深挖下去，就會觸及到公社體制的一個深層矛盾，即在脫離生產力發展水準的條件下，「一大二公」的公社體制與分散型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之間的尖銳矛盾，根本矛盾。只不知汪小川心裏是否明白，這樣的矛盾，在原有的公社體制下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解決的，所以，在後來包產到戶勢如破竹的八十年代，才會有公社體制的全面解體。當然，這一天是汪小川所無法預見的。他的難能可貴之處，是正視現實，正視已經出現的缺點和錯誤，包括政策上的錯誤，直言包產到戶所以「猖獗起來，就說明我們某些具體政策和措施上還有問題。」用語雖極謹慎、委婉，卻也隱隱透出他的某種焦慮與不安，所以，他極力主張從經濟上而不要從行政上去糾所謂的「單幹傾向」，很顯然，他是擔心使用行政手段會給農民帶來更大的傷害。囿於當時的政治環境，政治氛圍，以及他個人的身份與角度，他當然不可能把自己的懷疑與不滿都說出來，而只能將之深深地壓在心頭；但面對現實，面對農民們的悲慘境遇和農村實際，他又不可能違背良心，違背事實地瞎說一通。如此，內隱的心曲轉化為的外顯的矛盾——即糾正包產到戶和真實反映農民心聲的矛盾。可以說，沒有對大躍進，對人民公社的懷疑與不滿，就不會有這樣的矛盾，就不會有那些震撼人心的忠實記錄，自然，也不會再有那些婉約其詞，用心良苦的分析了。亦如他後來所言：「我之所以搞出這個調查，無非是遵循黨的一貫教導，我們應該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即使這些意見和呼聲全然不對，也應參照考慮改進我們的工作。」¹³ 他既非中樞高官，亦非方面大員，他的調查，無非是為某一個省的黨政首腦提供建言或參考罷了。從他那些迂迴曲折，委婉含蓄的分析中，我彷彿看到他深切的憂慮和從那憂慮中傳出的一聲聲歎息：長太息以掩涕泣兮，哀民生之多艱。

那麼，僅僅根據上面的分析就斷定汪小川對大躍進、對人民公社心有不滿，是否有武斷之嫌？對此，筆者雖無法再提供甚麼更直接的證據，但間接的材料也還是有一些。如他發表在1959年《團結》上的幾篇文章〈利用價值規律為社會主義服務〉、〈「誇大」和「誇小」〉等，就對當時的「共產風」和「浮誇風」提出了嚴肅的批評。在〈提「口號」的問題〉一文中，他指出「口號決不可以輕率提出」，「每一個口號的提出，都應該經過縝密的研究，要充分估計到能否以及如何實現它的一切條件。」這顯然是針對大躍進中亂提口號的現象有感而發的。另據作家戴明賢回憶，1961年，他隨宣傳口組成的工作組下鄉反「五風一化」，回省後組織整風學習，「汪老以『端正學風』的題目，把幾份在『大躍進』中忘卻一切客觀規律，大話說到荒謬程度的絕密檔，發到組裏讓我們這些小公務員學習。這種膽識和氣魄，當時令我們有點瞠目結舌。」¹⁴ 此外，汪小川寫於同一時期的「九篇歷史小故事」似也可作為重要的佐證。其中，〈李世民懷中的死鷄子〉已如上述，是講要敢於和善於聽取不同意見的；另有〈重耳用頭須禦車遊街〉、〈投鞭未能斷流〉則是講重然諾，講信義的重要，以及說大話、空話的害處；〈劉邦倒履迎酈生〉是講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其他如〈漢理財能臣桑弘羊〉、〈陶朱公——范蠡〉、〈會做生意又會辦外交的子貢〉等，都是宣揚和強調懂經濟，善理財的人才，顯係有感而發。這些故事，說的雖是歷史，但在當時特定的語境中，卻可謂切中時弊，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表現出作者相當的勇氣和膽識。不難想像，要不是心有所思，心有所感，在那個年代誰還敢冒著「借古諷今」，「含沙射影」的風險去拿古人來說事？

不過，筆者仍要指出，這裏一再強調汪小川心中對大躍進、對人民公社的懷疑與不滿，並非僅是為了正確解讀《二鋪調查》的需要，而實在是想藉以證明，至少在1962年——或者準確地說，至少在當年的北戴河會議以前，像汪小川這樣對大躍進以來的形勢深表擔憂，心有疑

慮的思想狀況，絕非個別和偶然，而是當時一大批高中低級幹部所共有的心態，並且已在黨內形成了一股激蕩的思潮。尤其是經過三年大饑荒之後，這股思潮，上承彭德懷1959年的理性之吼，下接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痛切陳辭，要求對過去幾年實施的政策進行全面的反思、檢討，及時地總結經驗，修正錯誤，儘快扭轉國民經濟的危險局面，儘快改善人民群眾的悲慘生活。如前所述，正是這樣的衝動與訴求，構成了七千人大會的思想基礎。在這個意義上，汪小川和他的《二鋪調查》，或者說，汪小川在《二鋪調查》中曲折表達出來的那些思想傾向，在一大批敢怒而不敢言的高、中級幹部中是頗具代表性的，因而對於我們分析和理解當時及以後的黨內鬥爭、黨內分歧和黨內思想狀況，都是頗有裨益的。

七、理性的聲音

大約從1956年起，伴隨著毛澤東左傾錯誤思想的發展，中共黨內就出現了一股與之相對立的，以理性、務實為特徵的思想傾向，這裏姑且將之稱為「理性的聲音」。在此後二三十年的歷史發展中，這一思想傾向時強時弱，時隱時現，一直頑強地存在著，並時有精彩的表現。如果以1956年周恩來、陳雲等人的反冒進為發端，¹⁵ 那麼，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發難和張聞天的呼應就可說是達到了高潮，後來在毛澤東的強力打壓下雖然偃旗息鼓，但其思想基礎並未瓦解，經過大躍進，經過連續三年的大饑荒，大潰退之後，又在1962年重新集結，日趨活躍，由此形成了一股激蕩在黨內的思想潮流。其最顯著的特點，就是要求對大躍進以來的政策包括缺點和錯誤進行必要的反思、檢省，這既是七千人大會得以召開的思想基礎，也是將有關包產到戶的爭論推向高潮的洶湧之波。

本來，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已作出了「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判斷，但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通稱西樓會議）上，他卻意外發現1961年竟有30億元的財政赤字，不僅如此，經向財政部門查詢，方知自1958年以來，年年都有不小的赤字，只是財政部門怕被戴上右傾帽子不敢上報而已。這一發現使劉少奇對局勢的估計再次發生了變化，認為經濟形勢恐怕將進一步惡化，他大聲疾呼現在是「非常時期」，認為，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甚麼？」¹⁶ 自此，他對形勢的判斷漸趨嚴重，對1959年的廬山會議未能及時糾左一直耿耿於懷，多次提到關鍵是廬山會議。¹⁷ 他曾疾言厲色地說：「如果我們現在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¹⁸ 甚至說過這樣的重話：「照這個趨勢，不採取堅決的措施，拖下去要滅亡。」¹⁹ 以至在同年六月底，當田家英在外搞完調查，返京向他匯報包產到戶可行時，劉不但當即表態「現在情況已經明瞭」，隨之提出分田到戶的主張，還說「這樣下去，無產階級專政要垮台，我現在一天也不敢離開北京。」²⁰ 可見劉對形勢的估計已經緊張到了何等地步。所以，當毛澤東於七月上旬結束在外巡視返京召見劉，責備他「你急甚麼？壓不住陣腳了？為甚麼不頂住？」時，一向恭謹從命的劉少奇卻表現出了少有的激動，抗聲道：「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²¹

事實上，不只是劉少奇，此時處於所謂中央一線的其他人如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陳雲、彭真等，哪一個不是憂心忡忡，面對危局。所以，在西樓會議上，劉少奇力邀陳雲出山，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並聽從陳雲建議，在五月的中央工作會上，作出壯士斷臂，「傷筋動骨」的悲壯之舉，大規模降低工業指標，壓縮基建投資，企業關停併轉，減少一千萬城市人口，將調整進行到底，避免了國民經濟的大崩潰。而正是在這一特殊的背景下，一

向受到非議的包產到戶，作為緩解困難的自救良策，再度引起了許多高層人物的關注和興趣。

首先是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田原先並不贊同包產到戶，他是奉毛指派率隊到韶山搞調查後才開始改變態度的。1962年6月底，田家英奉召返京，由於毛此時尚未回京，便迫不及待地抽空先後向劉、鄧等人作了匯報，力主實施包產到戶，得到劉、鄧的明確支持。於是在毛返京後召見他時，乃向毛提出包產到戶的主張。毛未置可否，卻出人意料地問田，你是主張以集體為主還是以個體為主？並問田是他自己的意見還是別人的意見，田見勢頭不妙，只好說是自己的主張，未敢再提劉、鄧等人的看法，事後卻幾次受到毛的點名批評。這之後再觸黴頭的是陳雲。這位自因反冒進受到毛澤東不依不饒的批評而變得十分謹慎的經濟專家，就連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盛情邀請都未能使之開口發言，此時卻按捺不住，主動求見，當面向毛提出重新分田到戶，以激發農民積極性的主張。毛聽後未表示意見，第二天卻傳來毛為之十分生氣的消息。²² 對包產到戶情有獨鍾的鄧子恢，更是不遺餘力，從1962年5月到7月，先後應邀到解放軍總後勤部、解放軍政治學院、中央黨校等作報告，系統地介紹包產到戶，並在得知毛澤東對包產到戶已明確表態之後，還向毛當面陳情，大談「責任田」亦即包產到戶的種種好處，引起毛的極度不滿；事後在北戴河會議上被作為「單幹風」的代表而受到嚴厲批判，最後索性連農村工作部和他所擔任的部長職務也一併撤掉了。

除了這些人所共知的大人物之外，還有許多為包產到戶而吶喊，而呼號的有識之士乃至於小人物。如時任河北省常務副省長、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的胡開明，就直接上書毛澤東主張實行「三包到組生產責任制」。因向毛澤東寫信「保薦責任田」而大名鼎鼎、也被當作「單幹風」代表大批特批的陳讓能，卻不過是安徽省太湖縣委宣傳部的一個小幹部。至於被毛澤東指斥為「浙江出了兩個半單幹理論家」的楊木水、馮志、陳新宇等三個年輕人，更是幾個位處最下層的小人物。不過，筆者這裏最想介紹的，是陝西省戶縣三位農民黨員於1962年5月聯名發出的一封題為〈當前形勢懷感〉的信。這封因毛澤東引用「一葉知秋」而轟動全黨的信，²³ 其真正的執筆者名楊偉名，時年四十歲。據撰文介紹此信的盧躍剛先生稱，信中「陳述之坦率，行文之從容，語調之平實，語言之練達，比喻之生動，觀察之細膩，態度之理性，意見之尖銳，問題之逼近，判斷之準確，思想之深刻，讓我大為震驚。綜觀20世紀50、60、70年代黨內和民間萬言書，以思想水準衡量，《當前形勢懷感》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²⁴ 下面的相關資訊即採自盧文。

首先，對於當時人人諱言的形勢，信中直言無忌的描述就顯得不同凡響。

目前我們已經承認『困難是十分嚴重的，而「嚴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農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現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騰代替了遍野歌頌，生產凋零代替了五穀豐登，饑餓代替了豐衣足食，瀕於破產的農村經濟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榮。同是在黨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領導下，何今暗而昨明？

針對逼人的形勢，作者希望能夠拿出「當年主動撤離延安的果斷精神」來應對形勢，放開嚴格控制的物資流通和自由市場，對中、小型的工商業改用「節制」之策以代替「改造」之法，農業方面則採取集體與單幹「聽憑群眾自願」的方針等等，要求「應進一步就整個國民經濟的方針政策作『全面徹底』地『調整』。」不僅如此，作者還對當時已顯得頗為敏感的民主集中制發表了大膽的意見，他打了個「雙程軌道」的比方，希望「民主」與「集中」能夠各行其道，暢通無阻，最終實現在廣開言路的基礎上，廣泛集中群眾意志形成正確決策的理想目標。如此等等，皆可稱切中時弊之言。

自不待言，筆者引用這封出自農村基層黨員之手的信的目的，除了藉以向這些中國民間思想的先驅表示我心中的敬仰之外，更重要的是想證明，前述那股起伏跌宕的理性思潮，在中共黨內有著何等深厚的基礎。但由於民主機制的缺失，更由於長期來已經形成了毛澤東乾綱獨斷，一個人說了算的極不正常的局面，這一波起勢不小的思潮還是在毛澤東的一意孤行下很快瓦解，煙消雲散了。7月8日，毛澤東召集劉、鄧、陳、田等開會，正式就包產到戶問題表明了他的態度，劉周鄧等不得不跟著轉向。7月18日，中共中央緊急下達了《關於不要在報紙上宣傳「包產到戶」等問題的通知》。在隨後召開的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大批所謂「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點名批評了主張搞包產到戶的田家英、鄧子恢等。至此，有關包產到戶的爭論戛然而止。毛澤東力挽狂瀾，一頓暴脾氣，就將這股洶湧激蕩的黨內思潮壓了下去。至此，1962年成了繼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又一個關鍵性的轉捩點：由七千人大會開啟的沿著正確軌道來糾正大躍進錯誤的理性聲音，在北戴河會議（以及八屆十中全會）上被打斷，被終結，中國的政治風向再次發生逆轉。只不過，由於擔心重演廬山會議因反右而停止糾左的嚴重後果，毛投鼠忌器，勉強同意了劉少奇在會上的提議，不將有關階級鬥爭的講話精神傳達至縣以下，從而使這次轉向顯得不那麼的急劇和猛烈；同時也使後來中國的社會走向，暫時出現了政治、經濟雙行線互相矛盾、發展的奇特局面。一方面是思想政治領域的階級鬥爭愈刮愈緊，不斷地反帝反修反資反右；另一方面則是經濟領域的繼續糾左、繼續調整。最後，在毛澤東左傾政治思維的主導下，兩者終於不可避免地由對撞而斷裂，於是，1962年也就不可避免地經四清而導向了文革。

這裏，還需提及七千人大會期間發生的一段小插曲。會上為修改劉少奇的書面報告，曾組成了一個陣容龐大的二十一人起草委員會，成員包括周、鄧、陳、李、彭、薄等一干重量級人物。在一次委員會舉行的討論會上，當談到該怎樣承擔錯誤時，彭真語出驚人：「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甚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²⁵ 像這樣公開地明確講毛有錯誤，不僅在當時，就是在此後的十數年間也僅見此一例！可以說，這是1962年那股要求反思大躍進錯誤的理性思潮所達到的最高點，也是其最精彩的一次演出。只可惜這樣的聲音太微弱、太稀有了，與毛此時已形成的說一不二的巨大權威相比，彭真的話只會招來大禍，他後來果然在文革中成了繼「三家村」之後第一批倒下去的黨內高幹。

當然，似也不該就此以為，這一股以理性、務實為特徵的黨內思潮，從此就灰飛煙滅，杳無蹤痕了。事實上，它並沒有被完全的打散、消解，更遑論徹底消失，而是隱沉下去，轉化為一股不動聲色的潛流，繼續積蓄著它的能量。文革期間，隨著一大批黨內幹部被打倒，許多人因此而墮入底層，走向民間，也因此得以了解到更多的現實，更多的民生疾苦，從而能夠與文革後期崛起的那股以反「四人幫」專制主義為特徵的民間思潮結合在一起，其思想認識有了前所未有的昇華與提高，故而方能共同演繹出威武雄壯的「四五」天安門事件，為「四人幫」的覆滅奠定基礎，並最終導致了鄧小平的復出和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如此才有了後來的撥亂反正，才有了平反冤假錯案、推行包產到戶，以及改革開放等等一系列翻天覆地的重大舉措。時至今日，這股理性思潮仍然活躍在中共黨內，並不時有所表現。至於它在往後會不會又出現甚麼驚人之舉，那就是誰也無法預料的了。

八、結束語

最後，還應該說說，對於本文中提到的那一股與毛澤東的左傾錯誤思想相對立的理性思潮，究竟該如何命名，又該如何去描述、刻劃，方能準確地概括或表達其特徵？這在本文的寫作中，也曾是一個令人困擾，讓我大費躊躇的問題。照我原先的想法，曾在某些官方文本中出現過的「黨內健康力量」一語本可作為成例沿用，但仔細想想，在毛澤東一言九鼎的巨大陰影的籠罩下，許多身居高位的領導人對毛都是唯唯諾諾，屈意附和，縱有異議亦不敢吐露心扉，道出真言，更遑論一般的黨內幹部了，既如此，所謂的「力量」云云又從何談起？再說，我想刻劃和描述的，主要是一種思想現象或者說思想傾向，它的構成很複雜也很模糊，它不是一個穩定、成型的東西，由一批相對穩定的人組成，恰恰相反，它是聚散無常，流變不定的，又具有因時因事因人而異的極端複雜性；成形時，它能呼風喚雨，翻天覆地；潰散時，它銷聲匿跡，遁之無形；最易聚合又最易消散，謂之「力量」，難免有將其固定化之虞。當然，除此之外也不是沒有現成話可用，譬如毛澤東說過的「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一語。說實話，如果要借用，我還真更傾心於這個「反對派」或「懷疑派」的稱謂。想想每每在重要關口，都會有隸屬於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站出來冒險發難，作獅子吼，其影響所及，難道還不足以成「派」麼？不過，也正因為這一點使我有些犯難和猶豫。代表人物不斷湧現固是好事，但代表人物同時也常常變來變去，此時一個樣，彼時又一個樣，忽左忽右，忽對忽錯。即如人所敬仰的彭德懷，在其主持軍內事務期間，不也曾有過批蕭克、批粟裕等過左的表現與作派麼？似這樣來劃「派」，豈不是反讓人更覺得不可捉摸，變化無常嗎？所以，我最後還是決定使用「思想傾向」一詞，或更模糊一些，叫做「理性的聲音」，雖稍嫌抽象、籠統，卻也有更具彈性和包容性的好處。按照這一概括，不管那發出「聲音」的人如何變化，這「聲音」總代表著一種與毛澤東的左傾思想相對立、相抗衡的思想存在或歷史事實，而且它從未間斷，從未止息。

那麼，按照這裏所說，將汪小川和他的《二鋪調查》放到這樣的背景之下，具體地說，納入到這一思潮之中進行考察和評估又是否合適呢？

確實，如果是僅就包產到戶而言，無論是汪小川其人還是他的《二鋪調查》，都無法與那些奮不顧身，敢為包產到戶挺身而鳴，甚至因此而遭來橫禍的人相比；若是就文本價值而言，《二鋪調查》無論是就影響還是就旗幟鮮明地為包產到戶鼓與呼的勇氣，都難以同陳讓能的《關於保薦責任田辦法的報告》、胡開明的《關於推行三包到組的責任制的建議》、以及楊偉名的《當前形勢懷感》等相比。但要是換一個角度看，像李雲河、陳讓能、楊偉名等這樣披肝瀝膽的悲情英雄畢竟只是少數，是鳳毛麟角；從當時整個黨內的思想狀況看，客觀地說，更多的人恐怕還是像汪小川這樣，在清醒、理智的認識中，更願意採取一種平和、徐緩，甚至是迂迴曲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看法。這是在黨內生活極不正常，毛澤東的巨大身影籠罩著全黨，支配著全黨的特定時期、特定情況下的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也可以說是毛澤東時代所特有的一種政治文化和思想文化現象。從這一點看，《二鋪調查》所反映的思想狀況和認識水準，同樣具有不可替代的文本價值，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黨內思想史資料。這大約就是汪小川和他的《二鋪調查》的意義所在，價值所在罷。

2007年元月4日—元月19日 初稿
元月20日—31日 改畢

- 1 轉引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992頁。
- 2 轉引自蕭冬連等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下冊，紅旗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626頁。
- 3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069頁。另按：這裏說的「八兩」、「十二兩」云云，是指改制前使用的老秤，16兩為一斤，合今之十兩；八兩為半斤，合今之五兩。
- 4 有關信陽事件的死亡人數，至今仍是個謎，有研究者指出，根據當年各縣上報的死亡人數統計，整個信陽地區的非正常死亡人口達到五六十萬之多，更有的估計接近或超過百萬。
- 5 見張素華著《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頁。
- 6 轉引自《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第690頁。
- 7 見張素華著《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19頁、15頁。
- 8 參見同上，第16頁。
- 9 參見同上，第132頁。
- 10 在貴州，「非正常死亡」最嚴重的還不是安順地區。據中共貴州省委向中共中央的報告，最嚴重的是遵義、湄潭、金沙三縣。按高華〈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後〉一文披露，其中金沙縣的「非正常死亡」為5.5萬人，貴州全省為174.6萬人。見《二十一世紀》網路版2006年五月號總第50期。
- 11 如叢進在《曲折發展的歲月》中推算，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4000萬人左右（見該書279頁）；而凌志軍在《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中，也提到一篇署名金輝的研究報告得出的結論是，「低限值也在4000萬人」；另有林毅夫的研究數字，死亡人數為3000萬，減少的出生人數為3300萬。（見凌書81-82頁）。
- 12 汪小川《我目擊下的貴州「大四清」》，1983年未刊稿第13頁。
- 13 同上。
- 14 戴明賢〈嶙峋風骨剛毅聲〉，載《貴州日報》2006年2月24日。
- 15 本文所考察的思想傾向，主要是指與毛澤東左傾錯誤思想相對立的那一股理性思潮，而1956年由毛所發動的合作化高潮，正是毛澤東左傾思想的發端，故凡屬1956年以前發生的與毛澤東的思想紛爭和意見分歧，即使事關重大或表現尖銳，都不在考察之列。
- 1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1052頁。
- 17 參見蕭冬連等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下冊，第802頁。
- 18 同上，第754頁。
- 19 同上，第796頁。
- 20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229頁。
- 21 劉源、何家棟〈四清謎團〉，見《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90頁。
- 22 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第1086頁。
- 23 毛引述的話如下：「最近，陝西一個公社有人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說現在有些地方出現包產到戶，是『一葉知秋』。我說不對，也可以一葉知冬，冬過了還有春嘛！總之，不要盡講黑暗。」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243頁。
- 24 盧躍剛〈一篇文章與一個農民〉，見山東畫報社編《老照片》2003年第27輯。
- 2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機構與事件的回顧》（下），第1026頁。

杜應國 筆名籃子。著有散文隨筆集《山崖上的守望》。現居安順。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六十二期 2007年5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六十二期（2007年5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